

敘說越界：緬甸雲南移民的故事

劉斐玟

中研院民族所

在全球化的脈絡中，離散人群、移民或難民研究可說是過去一、二十年來的當紅議題，也是人類學者不得不正視的現象。本書所探討的即是緬甸雲南移民的辛酸史。歷來關於漢人的離散人群研究多著重跨海移民（例如，從中國沿海前往東南亞），對於取道陸路的跨國遷徙仍屬少見，張雯勤的新作《Beyond Borders》，彌補了這一頁空白。本書不以雲南移民如何「落地生根」為重點，而是以「人的流動」作為軸線，進而打開雲南移民的動態空間視野：從雲南到緬甸，再轉進泰國，乃至台灣，爾後又進入中國所屬的廣州、香港等地。在流動的過程中，他們所跨越的「疆界」（borders）不僅是國境，更是移民如何透過教育、經濟等活動，力爭上游，以之跨越身為難民的社會地位、階級，乃至性別藩籬，而這，也是張雯勤以《Beyond Borders》為書名的要旨所在。

要呈現中國雲南移民的流動空間，首要之務還是要先瞭解它的歷史向度。宋、元之際，蒙古人為了對抗宋人，繞道取徑西南，帶入大量回民入駐雲南；明清的開闢西南和改土歸流更引入大量漢移民入滇。這些在雲南的漢人和回民，自十六世紀以來便跨越邊界進入緬甸，進行貿易和採礦等活動。在中緬邊境崇山峻嶺的地理環境中經商，既需仰賴騾、馬輸送貨物，也需有自衛能力以防山賊打劫，因之有了商隊組織，商隊又吸引了農民在農暇時前來充當馬夫、搬工以賺取外快，商團行旅也因之成了雲南經濟的一環，當中有些人甚且移民緬甸。1949 年中國共產黨取得大陸政權後，再有一部份雲南人逃難緬甸山區成為非法移民。緬甸的撣邦、克欽邦一帶，叢林密布，道路崎嶇，交通閉塞，政府主權鞭長莫及，提供了「逃難」絕佳的地理條件。這些移民有些是國民黨的殘餘部隊，有些是跟隨或接受國民軍隊保護，以避免緬軍攻擊的難民。隨後，國民黨軍隊及隨行的平民且轉進泰北。為求營生，這些軍民夾雜的移民或難民，也以商隊行旅的方式進行貿易（包括走私違禁品）。1988 年緬甸政權更迭，帶入市場經濟，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境的經濟活動也隨之多元。本書所探討的就是在此一歷史變革中，前往緬甸逃難的雲南人「跨界」的過程。

本書既然以「人」的流動作為軸線，如何呈現個人的生命經歷便成了本書的重頭戲。為了彰顯移民的「主體性 (subjectivity)」，一種既有游離邊緣性格 (liminality) 又兼具能動性 (agency)，且是不斷建構、變動中的主體性 (頁 11)，本書作者採取了「個人敘說手法」(personal narrative approach)，亦即運用各種形式的「敘說」，如書信、民歌、口語訪談等素材，以當事人的話語來鋪陳當代緬甸雲南移民的經歷。這些所謂的「當事人」或「敘說主體」，有國民黨軍隊的成員、家眷，或一般平民，他們或從事貿易走私或寶石買賣，或僅是貿易活動中的勞動者 (騾馬車夫)，他們之中既有漢人也有回民。

本書除導論和後記外，各章節的安排，主要是透過不同類型的敘說者，來勾勒不同面向的移民處境。第一章的「張大哥」、第二章的「貓女」，和第三章的「父與子」敘說的是他們在緬甸撣邦的成長經驗、爾後的移民遷徙 (泰國、台灣)，以及身處「異鄉」的情感糾結，包括他們的迷惑、疏離、奮發的意志力、對生命的渴望與憧憬。既是憧憬，他們所陳述就不一定是親身經歷，而可能僅是心嚮往之或記憶所及的歷史過往或心理現實 (mental reality)。上述幾位主角都屬漢人移民，第四章則是將回民也納入討論，特別是他們在宗教認同和實踐之間的潛在張力。本書的第二部份則是將敘說視野從個人的移民經歷，轉而討論這些移民作為一個群體的經濟營生，在泰緬邊界跨越崇山峻嶺的馬幫商隊 (第五章)，乃至玉石買賣和它所需的跨國行銷網絡 (第七章)。馬幫和玉石都是以男性為主的經濟活動，但當男子都外出打拼，甚至沈迷毒品時，女子如何扛起家計重擔 (如：經營小販生意、釀酒、長途跋涉買賣寶石、種植罌粟、跨境走私違禁品、標會、借貸等)？第六章便是處理相關的性別議題。這些不同人物的移居過程與生命感知，鋪陳出二十世紀中葉迄今，中緬泰邊區的政經動態。而這也正是「敘說手法」所希冀呈現的視域：由個人經歷窺見社會的多元、文化的層累，和歷史的變革。

「敘說」的研究取向表面上看似輕巧方便，只要將當事人的話語「搬上台面」即可，但其中卻暗藏兩大挑戰，其一，研究者需有令報導人願意「傾囊相授」的能力和魅力。「我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說不完」(頁 1)、「我的故事三本書也寫不完」(頁 1, 181)，可是如何讓當事人願意「說出來」？前提當然是要先贏得對方信任，繼而建立起分享生命經歷的情誼。本書作者張雯勤自 1990 中期就開始經營田野，歷二十餘年而不輟，且能經由原先的田野報導人不斷地輾轉引介，建立她豐富多元的報導人網絡，足見作者具有身為一位優秀人類學家所必備的人格特質：誠懇的心態、聆聽的能力 (包括及時的回應和適時的沈默)、長時間鏗而不捨的田野實作，以及不畏艱難的研究精神 (中緬泰邊境特殊的政經地理，更增加其田野考察的難度)。舉凡這些特質，只要細讀敘說主體如何向

本書作者張雯勤訴說他們的生命經歷，讀者便可心神領會。不過，凡事總有它的一體兩面，研究者和報導人所建立的「情誼」可以帶領讀者進入民族誌的田野場景，但也可能給人類學家帶來情感負荷。以第二章為例，當作者發現她的情緒完全被「貓女」的困境所吞噬時，不禁問道：「什麼是人類學家的界線？」（頁 78）

「敘說」的第二大挑戰在於它只是對生命經歷的「陳述」（account），而不是生命經歷本身（Runyan 1986）。誠如作者在導言中所揭示，敘說永遠只是生命的片段記述，而且不免有前後矛盾、甚至扭曲之虞；敘說主體所陳述的內容也受限其敘說「意向」（intention）。如何從報導人的「敘說」中抽絲剝繭，洞察故事中的「虛」與「實」，這就有賴研究者的慧心明斷。本書第三章李氏父子的敘說提供了很好的範例。特別是李父，因身為國民黨軍隊的領導要職，他所「陳述」的內容不免夾雜著親歷與耳聞（既是耳聞，就有「以訛傳訛」之虞），且多彰顯其英雄事蹟。「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每個人的「陳述」與「述說」又何嘗不然？！本書第三章透過父子兩人的敘說對照，提供了「敘說手法」在方法論上絕佳的反思素材。

敘說既是「陳述」，而陳述又離不開「象徵」，這也意味著當事人所敘說的意涵並非不證自明，而是要鑲嵌在個人生命史的脈絡和更寬闊的社會、文化，乃至歷史情境下來展讀，方能揭示「敘說」多層次的象徵意涵：既是心理的、情感的，也是政經局勢與歷史變革。而「個人敘說」如何指向個人的情感意緒、社會文化情境，和歷史意識，就有賴研究者的穿針引線。易言之，「敘說的手法」雖是將話語權交付到當地人或報導人手中，但這並不意味研究者可以全然隱身，研究者其實更像是「說書人」，必須居中串場，甚至挑明敘說話語的深層意涵。本書作者在連結敘說作為民族誌的理論意涵時，多能扮演「畫龍點睛」的角色（特別是有關離散人群和邊緣性的議題上），但在連結到敘說主體的個人生命歷程及其人際互動網絡和當下所處的社會情境等方面，作者就顯得相對「保守」（如張大哥、李氏父子、周大姊、薛大嬸等）。如能將相關情境說明的更清楚，那麼敘說主體所呈現的畫面也會更加立體。

本書作者深入長久以來政治封鎖的泰緬山區進行田野考察，實屬不易，其敘說主體又能兼顧各個不同階層的人群，更是難得。如果硬要「雞蛋裡挑骨頭」，那麼本書美中不足之處就是欠缺「結論」；有些篇章略做小結，有些則是戛然而止。對於後者，作者在導言中解釋，其用意是「將戛然而止的當下，置身於民族誌的情境之中」（頁 10），這也算是作者對其民族誌書寫的匠心設計。筆者猜想，作者刻意「懸置」結論，或許是要強調：本書既是探討「移民」，而移民的特質就是「移動」，為免結論「凝結」它的流動

性，故捨之。其實，結論不必然是「蓋棺論定」，而是可將個別敘說主體的生命史交相縱橫織緯出一個「橫看成嶺側成峰」的文化歷史景象（cultural-historical landscape），藉此或可開展出更多可能的對話空間，也可幫助讀者建立一個更清晰的民族誌圖像。

當然，瑕不掩瑜，本書的個人敘說手法將緬甸的雲南移民，不只放在田野考察的當下，而是回溯到更寬廣的歷史脈絡和政治經濟局勢下來理解；她所記錄的離散人群，也不只是勞工，難得的還包括軍事移民和跨境的行旅商隊。更重要的是，透過本書的出版，她迫使「歷史側身聆聽（個人生命中的瑣瑣碎碎）」（Portelli 1997: viii）。如是，個人就不只是微不足道、靜默無言的小我，而是參與歷史、創造歷史的主體了！

對敘說手法、邊境研究、離散人群或移民，乃至高地東南亞有興趣的讀者，本書絕對是其書架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傑作。

引用書目

Portelli, Alessandro

1997 *The Battle of Valle Giulia: Oral History and the Art of Dialogu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Runyan, William Mckinley

1986 *Life Histories In Anthropology: Another View*.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8(1): 181-183. doi: 10.1525/aa.1986.88.1.02a00220